

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另一种观照

马建英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力图从卢梭这个视角重新考察和探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义。对卢梭观点的认同与批评涉及到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进步与保守、启蒙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对抗和冲突,也涉及到西方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处境问题。

关键词:卢梭;浪漫主义;启蒙现代性;文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153(2003)06-0056-04

发生在20年代末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人们一向关注的热点。这次论争涉及到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民众与天才、文艺要不要大众化、文学的翻译等诸多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多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遗憾的是,他们大都没有将这次论争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宏大的历史语境下来考察,尤其忽略了卢梭在这场论争中的作用。本文就以卢梭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这场论争的意义。笔者认为,在这场论争中,对卢梭思想的拥护与批评涉及到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进步与保守、启蒙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对抗和冲突,以及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处境等重要问题,也折射出五四学人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复杂选择。

1928年,中国新文学上的三个重要人物鲁迅、郁达夫、梁实秋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次论争从1927年10月11日《复旦周刊》创刊号重新刊出梁实秋的旧文《卢梭论女子教育》开始,到1928年5月1日郁达夫作《关于卢梭》逐渐平息,历时半年多。事后郁达夫评论这场论争“各有各的成心,各有各的偏见,两条平行直线,是永也不会相遇的”。这次论争虽时间不长,参加人数也不多,但如果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看,把它纳入到五四新文化建设的大本营里,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罗钢在《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中评价这

次论争:“如果我们仍记得白璧德的话,对于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人文主义者来说,卢梭乃是一个代表着西方近代民主潮流的精神符号,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们(鲁迅郁达夫)捍卫的不仅仅是卢梭,而是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原则和文学传统。”无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他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值得景仰的。

这场论争的发生并非偶然。事实上,梁实秋于1926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已经将自己与鲁迅、郁达夫划分了界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梁实秋曾与创造社学人包括郁达夫一度走得很近。梁实秋早年与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不满于当时的新诗,认为“白话为文,顺理成章,白话为诗,则问题甚大”,对胡适的八不主义的主张“并不完全折服”,遂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阐发他们对新诗的看法。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回信引梁、闻为知音,称赞评论“像是在暑夏吃了一杯冰淇淋”。在此之前,梁、闻对郭沫若的《女神》已佩服得无以复加,称郭沫若为“现代第一诗人”。这时的梁实秋带着五四的激情,崇拜高扬蹈厉的拜伦,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冬夜草儿评论》的发表期间还有段小插曲。据梁实秋晚年回忆,当时闻一多先写了《冬夜评论》由梁实秋投递给晨报副刊(当时副刊的编辑是孙伏园)稿寄之后如石沉大海,写信

收稿日期:2003-10-06

作者简介:马建英(1979—),女,山东兖州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

去请求退稿也不蒙覆,梁实秋说:“我以前没投过稿,也许是我不懂行规”。于是写《草儿评论》与《冬夜评论》自费合集出版。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至此以后,梁实秋也许就对鲁迅筑起了一道屏障。时隔近半个世纪后,梁实秋还耿耿于怀,可见此事对他的影响。

至此,闻一多、梁实秋与创造社其他学人的友谊有了迅速的发展,梁实秋也承认:“不过我和一多和创造社发生了一点点关系是自兹始”。梁实秋的散文、小说和诗也陆续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刊》上发表。他们秉承“艺术至上主义”的艺术观,共同切磋诗艺。1922年初秋,梁实秋在清华毕业,准备赴美国留学。在上海盘桓期间,曾与创造社朝夕相处,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交往甚密。如果说暂时的艺术上的共同追求把他们聚到一块儿,但根本的艺术价值和人生价值的不同却始终使他们无法完全溶在一起。他们在更深层次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两件事让梁实秋记忆深刻。一次是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如几位饮酒。“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梁实秋对他们饮酒作乐、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颇不以为然。还有一次,郁达夫北上北京,向梁实秋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寻访圆明园遗址,一是去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对后一个要求,梁实秋不胜骇然,“未敢奉陪”。也许缘于个性和生活作风的不同,反映梁实秋与郁达夫有着更深层次的不同,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所以梁实秋拒绝加入创造社,另起炉灶,创办了《新月》杂志。一直到1928年关于卢梭的论争,梁实秋含沙射影的称郁达夫为浪漫主义文人,道德败坏。当闻一多与梁实秋以坚定的新人文主义的姿态出现,秉承白璧德思想和学说后,他们开始与郭沫若、郁达夫分道扬镳。

从美国回来后的梁实秋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如果说先前对创造社诸君子筑起防线是出于家庭出身与所受教育之故,那么现在梁实秋彻底清算自身的浪漫主义,攻击卢梭则有了理论依托——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从而确立了古典主义的立场,站到了浪漫主义的对立面。

1924到1925年间,梁实秋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学习《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并研读白璧德的著作,使他“从‘极端的浪漫主义’立场转到了‘多少近乎古典主义’的立场;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回国后他对新诗已不像先前那样乐观,对整个

新文学也相当消极。先前所认同和维护的浪漫主义成了他极力批评的靶子。显然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思想转变的关键。

白璧德是西方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新人文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空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整个西方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怀疑和迷惘,开始迅速分化。一部分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以白璧德为代表的一小部分选择了保守主义,他们总结了导致这场浩劫的原因,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救世良方。白璧德将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现代人传统信仰的丧失和道德的沦丧,并把眼光投向了历史和传统寻求救世的良方。白璧德认为西方自近代以来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自培根以降的科学主义的膨胀;一个是卢梭以降的浪漫主义的泛滥。前者白璧德称为“科学浪漫主义”,后者称为“泛情浪漫主义”。前者直接衍生出社会进步的发展观,造就了人类的文明,但也导致了人欲横流和人的异化。后者将人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地位,但也导致了道德沦丧和人的堕落。所以在白璧德看来,西方近现代思想的主流是浪漫的。所以白璧德找到了批判的靶子——卢梭。一个西方学者这样概括新人文主义:“它规定了一个中心的敌人:浪漫主义;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卢梭;一个主要的目的:把文学批评与伦理学结合起来。而衡量一部作品质量的基本方式,是看其道德性质是否纯正。”

白璧德首先批判的是卢梭的自然人性论。自然人性论,也就是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提出的。它一反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自然权利和感性欲求,并以此建立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政治理论。卢梭的“返回自然”的口号,并不仅仅意味着返回人类原始的生活状态,返回朴野美丽的大自然,更重要的是返回人的自然本性,回归到尊重自我、尊重人的自然权利和个人意志的世界中去,其中包含着浓郁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内容,以及对摧毁一切束缚人性的革命激情。这对被几千年来封建文化束缚和钳制的知识分子来说,象一道光,给了他们一个光明的希望,也使他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五四学人宣扬卢梭思想的原因所在。白璧德则从当时的社会危机出发,认为正是这种所谓的“自然主义”导致了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坍塌。他提出了人性善恶二元论。认为人有理性与情感,一个是“施加

控制的自我”,一个是“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他强调理性对情感的节制,强调外在的权威和规范。如果说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强调的是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外在权威规范的反抗和超越的话,白璧德的“人性二元论”则强调的是社会与传统借助于某种内在精神力量对个体施加的控制,企图维护和巩固现有的秩序。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是时代的主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当务之急。“启蒙与救亡”是整个时代的主题。这与早已经确立现代性的西方国家的境况完全不同。梁实秋直接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移植到中国,解决当时的问题,显然对中国的历史现实缺乏深刻的了解。新人文主义,在封建主义势力仍然强大的中国社会,对披荆斩棘的五四新文化人来说只能是古典保守落后的,只能成为建立崭新社会和文化的阻力。鲁迅郁达夫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捍卫了卢梭。

梁实秋对卢梭及浪漫主义的批判,除了1928年论争中的几篇外,主要在下面几篇文章里:《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文学的纪律》、《文学与革命》、《文人有行》、《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等。

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一文,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浪漫的混乱”。无论就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还是新文学本身,确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评价新文学运动有浪漫之趋势,也并没有错。从总体上说五四时代确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关键在,梁实秋将其定位“混乱”,而没有看到新文学运动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狂飙突进的热情。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写道:“卢梭登高一呼,皈返自然,这一个呼声震遍了全欧,声浪不断地鼓动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学里还展转发生个回响。”可见,梁实秋对卢梭对新文学的影响还是有清醒认识的。梁实秋从四个方面分析新文学运动的浪漫趋势:“根本的是受外国的影响”、“推崇感情轻视理性”、“所采取的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主张皈依自然侧重独创”。归结为两点就是:五四新文学极端承受西方影响而将中国传统过分否定,只知破坏而不图建设;五四新文学运动出现情感的泛滥,缺少理性的节制。

第一点涉及的是西化与反西化、西学与传统、反叛与继承的问题。梁实秋认为,五四浪漫主义者“因国内的文学传统的关系,层层桎梏”,一味的要求自由、新奇,便要求打破现状,方法是“引入外

国势力”。他们有一种“现代的嗜好”,认为凡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凡是外国引进的都是新颖的,凡是本土传统的都是陈旧的。李欧梵曾总结: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着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梁实秋则认为旧的未必就是坏的,外国的也不全都是好的。不加节制的引进外国的东西,只能失去传统的根基,造成混乱。可见梁实秋的传统情结是很浓厚的。如白璧德所说,要“保持住真理的灵魂,这种灵魂就包含在它的伟大传统中”。梁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只知破坏缺乏建设极为不满,认为新文学运动从过度的严酷的规律一变而为过度的放纵的混乱。他评价五四新文学“第一步是打倒中国的固有的标准,实在不曾打倒;第二步是建设新标准,实在所谓新标准是外国标准,并且即此标准亦不曾建设”。在《文学的纪律》里,梁实秋说:“总结起来说,全部的浪漫运动是一个抗议,对新古典派的主张的一个抗议。这一个抗议是感情的,不是理性的,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换言之,浪漫运动即是推翻新古典的标准的运动。”梁实秋显然是从古典主义立场出发,将这场浪漫的运动纳入到新人文主义的轨道来考察。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重视传统、讲究秩序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显然,梁实秋对五四特定的历史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束缚和钳制,使得伦理纲常已深入人心,反封建的任务尤为艰巨。新文化运动者对此有深刻的洞察。鲁迅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作为那个社会和文化的象征,是十分恰切的。鲁迅也深感“昏睡的绝大多数人”的不觉悟,以及“较为清醒的几个人”所受的“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鲁迅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清醒深刻的洞察,使他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呐喊。封建势力仍然强大,民众启蒙的任务仍然很艰巨。郭沫若在他的长诗《凤凰涅槃》中生动的揭示:个体与集体的热情之火将把以往的陈迹统统烧光,在这灰烬中,新中国这只凤凰将会再生。要砸碎这封建的枷锁需要狂飙突进的热情和破釜沉舟的勇气。在五四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激烈的反传统虽有流弊,但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革命策略。

五四的青年,活力充沛,斗志昂扬,眼前的一切现实他觉得丑陋难堪,他所期望的是未来。对于过去,取的是遗忘的态度,对于传统,取的是否定的态度,对于现在,取的是破坏的态度,对于将来,

取的是猛进的态度。整个浪漫运动是激进的、破坏性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这一倾向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浪漫主义。郁达夫曾提到外国文学里这种浪漫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很多。而在中国文学里,以殉情主义的文学居多,这种文学大抵是缺乏浪漫主义猛进的豪情和实行的毅力,而是静止的、舒缓的,不像浪漫主义似万马的奔腾、狂飙的突起。郁达夫在谈及西方浪漫主义进程时总结到:“总之,我们实际上要想把固有的习惯打破,要想作一番新的事业的时候,总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在前开道才行,这事实历史上是早已经证实了。”并引证了法国大革命的事例,认为十八世纪以后复活的浪漫主义,其反抗现实的倾向,时代弹劾的精神,影响了法国政治,遂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而当浪漫主义波及到个人生活的时候,就有了个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可见郁达夫对浪漫主义也有深刻的认识。

第二点,梁实秋认为新文学运动有泛情主义的倾向。他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人们“处处要求扩张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的老虎一样,不但把礼教的束缚层层打破,把监视着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这主要源于他的人性二元论。梁实秋认为人性包括理性和情感,理性占据最高的位置。理性应该对情感进行制裁和约束,他认为新文学对感情推崇过度,大都对感情没有选择和醇化。尤其提出新文学的人道主义色彩,存在过度普遍的同情心的倾向。梁实秋将这种情感流溢称为“号啕”。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里提到感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没有人比卢梭更富于感情,更易于被感情所驱使”。白璧德也认为理性精神和情感想象的对立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最根本的艺术分歧。这点在新文学初期的确很突出。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出现了许多日记、书信及自传性质浓厚的作品,许多作家往往率真的将自己的苦闷与悲哀一览无余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却缺少对情感的选择和节制,使得许多作品浮泛粗糙。梁实秋能够在情感泛滥之时,提出创作需要经理性的过滤,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郁达夫在《文学概论》里也曾提到浪漫主义因为情感太无御制,会使文学陷入空疏粗笨的危险。但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这种倾向是有其原因的。五四文学引进西方的文学思想,开阔了眼界,加之刚刚从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抑下解放出来,因而具有一种坦率、富有朝气、充满激情的精神气质。他们情感的流溢是青春活力的表现。郁达夫虽认识到浪漫主义的这一危险,但还

是对浪漫主义的这一特征作了充分的肯定:“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得发见。”夏志清说:“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的那种乐观和热情,与受法国大革命激励而出现的那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以上来看,梁实秋对新文学运动及卢梭的浪漫主义进行批判时,直接移植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未考虑到新人文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他的古典主义的立场和主张并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语境。梁实秋的一系列观点,具有文化现代性的特征,他的思想具有某种超前的意识,但对于当时迫切需要建立社会现代性的中国现状来说,具有不合时宜的早熟性质。我们只能解决历史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卢梭,这个世界级的人物,作为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作为个性解放、平等、民主、自由的象征,对中国而言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 [1]许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2]俞兆平. 写实与浪漫[M]. 上海三联书店,2001.
- [3]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 [4]刘炎生.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5]陈漱渝. 鲁迅论争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6]俞兆平. 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 [7]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
- [8]俞兆平.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兴起[J]. 文史哲,2003(3).
- [9]卢海英. 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另一种观照[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 [10]胡博. 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思辨[J]. 东岳论丛,2001,(6).
- [11]陆克寒. 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化处境[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责任编辑:走车)